

隐性采访：舆论监督的特殊手段

彭 桦

摘 要：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形态，对权力机构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自由表达看法的客观效果。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会因为自己的隐性采访而沾沾自喜，也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会把隐性采访当作自己的主要采访手段，更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会觉得隐性采访比正常采访简单和获得更多的职业成就感。为达到新闻舆论监督的目的，隐性采访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采访手段。

关键词：隐性采访；舆论监督；公众知情权

作者简介：彭桦，男，四级摄像师。（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信息中心，浙江 杭州，310012）

中图分类号：G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2）03-0087-03

一

隐性采访，在学理上称为暗访、秘密采访，俗称偷拍偷录等。但一般认为隐性采访，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一种采访形式。^[1]

隐性采访最早的实践者可以追溯到英国记者 W. T. 斯蒂德。1885 年，他以“买了一个女孩写故事”而闻名于英国调查性新闻事业史。之后，美国女记者伊丽莎白·克科伦为调查莱克韦尔岛精神病院病人的受虐待情况而假扮成精神病人住进其中，写了三篇相关长篇报道并在《纽约世界报》上发表并取得了重大的反响。由此可见，最早的隐性采访，其初衷是为了发掘事实真相，保护公众利益。

我国现阶段的舆论监督给了隐性采访生存空间。舆论监督，是一个把“舆论”和“监督”合二为一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组，即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形态，对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自由表达看法的客观效果。其主要的渠道便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是赞扬、建议、批评。“舆论监督”含义已经从舆论学概念演变成了大众媒介的“批评报道”，“舆论监督”实际上几乎等同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监督，即“媒介监督”或“新闻监督”^[2]

隐性采访被当作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特殊手段，并且被大众媒体广泛应用。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第一，采访到真实性材料越来越难，正常的采访受到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的阻挠。社会单位与部门只对正面的新闻报道感兴趣。采取隐性采访可以减少许多交涉的环节，所采访到的材料也会更加真实；第二，社会与公众赞成、认可隐性采访。在现代社会中，公众迫切需要新闻媒体提供大量真实的、有现实意义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现实中阴暗面的事实；第三，由于大众对于各种新、奇、特的报道情有独钟，新闻媒体受利益的驱使，迎合大众。

二

因为隐性采访的特殊性常常引发新闻侵权和新闻诉讼。一方面，记者不同于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在隐性采访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容易触犯法律。为了方便媒体与记者在操作隐性采访时避免法律纠葛，一些法律和新闻学专家学者为此专门给隐性采访进行了分类。借鉴世界各国警方侦查案件回应侦查与诱导侦查的方式，隐性采访分为两种类型：回应型隐性采访和诱导型隐性采访。^[3]

回应型隐性采访是遵循已有证据表明暗访对象的行为已经或者正在严重侵犯公共利益的原则。根据犯罪在前,侦查在后的回应侦查的理解,与国际上采取隐性采访方式所应普遍遵循原则悄然吻合,这种采访方式比较谨慎,不易引发法律纠纷。

诱导型侦查是指对于某些隐蔽性特别强的犯罪,侦查者往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犯罪的过程,对于潜在的追究对象进行某种程度的引诱,诱导其犯罪或者为其提供犯罪的机会,然后才将其逮捕、起诉。在诱导型隐性采访当中,由于媒体与记者对新闻事实的发生起到诱导的作用,没有媒体与记者的参与,这种新闻就不一定在被发现的时候发生,也基本上不可能被发现,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而且,由于诱导型侦查主要针对的是特定的犯罪行为,而隐性采访一般针对的是违纪违法行为和程度较轻的社会不良行为,法律也没有赋予记者特权引诱采访对象制造新闻,记者在开展隐性采访时并未履行法定的审批程序。因此,新闻记者无权进行诱导型的隐性采访,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3]

隐性采访可能对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造成侵害,最容易受到侵害的人格权是:1. 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侵害人格尊严就是侵害一般人格权。2. 名誉权。名誉权是公民、法人最重要的人格权,法律加以严格的保护。在新闻报道中,对公民、法人进行诽谤、侮辱等,使名誉权受到损害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媒体应当承担侵权责任。3. 隐私权。隐私是公民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对于这些隐私内容,只有权利人自己才能够支配,不得任何人侵犯。在隐性采访中,最容易受到侵害的人格权,就是隐私权,最容易发生侵害隐私权的冲突。隐性采访侵害了隐私权,就构成侵权。4. 肖像权。肖像权是只有公民才享有的人格权,是对自己的肖像及其利益进行支配、保护的权力。在法律规定上,肖像权的保护,主要是未经本人允许不得非法使用他人的肖像。在现实中,未经他人允许,偷拍、偷录他人的肖像,也是不允许的,除非具有合法的抗辩理由。5. 信用权。信用权是公民、法人维护社会对自己的经济方面客观评价的权利。媒体对公民、法人发生经济上的困境,正在进行积极努力争取摆脱困境的报道,事实是真实的,报道是客观的,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但是这样的报道会使该民事主体的社会经济评价降低,信用受到损害,构成对信用权的侵害,严重的要承担侵权责任。

大众媒体采取隐性采访时要遵守法律,正当行使新闻批评的权利,运用好侵权行为的抗辩权,就可避免新闻侵权的责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新闻媒体对抗新闻侵权主张的正当抗辩事由有以下几种:

(一) 公众知情权。知情权即知的权利,也称作知悉权、了解权,是美国新闻编辑肯特·库琅创造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当知道的事情,国家应当最大限度的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我们所说的公众知情权一般含有以下内容:一是知政权,即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二是社会知情权,即知道他所感兴趣的社会变化和发展的情况;三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包括对自己的信息的知情权和对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人的信息的知情权。例如自己的出身,恋爱对象的有关信息等。^[4]新闻媒体的职责就是将社会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事实,告知公众,以满足公众知的需要。因此,公众知情权是新闻报道的最有力的抗辩事由。在一个侵权纠纷发生之后,如果新闻媒体报道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并且没有超出正当的报道范围,就不应当认为媒体是侵权。

(二) 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在新闻报道中,如果涉及到肖像的使用,涉及到个人私密的报道,只要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就可以对抗新闻侵权的诉讼请求。法庭确认这一抗辩事由,就可以免除新闻媒体的侵权责任,成为正当的新闻报道行为。在揭露一些对违法活动的隐性采访中,之所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而不被法律所追究,就是因为这种采访和报道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

还有一些抗辩事由,在正常新闻报道中可以使用的,如新闻性、公众人物等,可以对抗侵害肖像权等的诉讼请求,但是在隐性采访中都必须十分慎重,稍有不慎,就会构成侵权。

三

个人认为，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会因为自己的隐性采访而沾沾自喜，也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会把隐性采访当作自己的主要采访手段，更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会觉得隐性采访比正常采访简单和获得更多的职业成就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新闻调查》栏目的工作手册可认为是国内较为成熟的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自律程序规则。现将其中关于隐性采访的部分摘录如下：

“对‘偷拍’我们慎之又慎，除非调查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隐情而又别无他法，且经制片人同意，否则我们决不采取任何涉嫌欺骗、侵权的拍摄方式。”

“如何处理有可能引起争议的信息——对一些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宗教、民族的敏感话题，能否关注，先请示制片人。”

“我们还要在公开调查和秘密调查这两种方式中进行选择。秘密调查，就是所谓的‘暗访’、‘偷拍’。无论如何，秘密调查都是一种欺骗，新闻不是欺骗的通行证，我们不能以目的正当为由而不择手段。秘密调查不能用作一种常规的方法，也不能仅是为了增添报道的戏剧性而使用。只有同时符合下述四条原则，才能采用秘密调查：（1）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调查的是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2）没有其他正常途径收集材料；（3）暴露我们的身份就难以了解到真实状况；（4）经制片人同意。另外，使用长镜头往往会使被拍摄者在不知不觉中被拍摄；还有，利用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偷拍资料也涉及秘密调查问题，我们同样要求符合上述四条原则。”“我们将采访意图明确相告，尽量征得对方同意，对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残障人士或未成年人应征得监护人同意，如有必要，请对方签署书面同意意见，我们也可以为对方出具对画面、声音进行处理以对其实施保护的书面承诺；对有特殊规定的被访者（如政府高级官员、服刑人员），按规定请示有关部门。”

我们不能因为隐性采访的某些弊端，而彻底否定记者的职业信念和职业操守，臆断记者以隐性采访为荣，或者就一厢情愿地认为隐性采访就比正常采访简单。

“舆论监督，本应是公众通过传播媒体对国家、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的一项宪法权利。”^[5]但在现实中，“舆论监督更多的是针对社会公共生活，尤其是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组织及个人。而这些对象正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的对象。因此，舆论监督实质上又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监督政府的手段。”^[6]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虽然获得了来自政府权力机关的支持，但总体环境并不理想，记者的许多行为处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的灰色地带，这也使得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比较困难，正如徐光春所概括的“采访难”、“取材难”、“获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难”、“解决问题难”^[7]新闻采访和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调查不同，它应该是被采访者自愿接受的新闻职业行为，不能有丝毫强制性。但是，记者正当公开的采访极易受到被访者的拒绝或当事人的报复，为达到新闻舆论监督的目的，隐性采访便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采访手段。如果法律保证公民获得信息的渠道畅通，如果社会的各个部门都能够正确看待新闻对社会和人民的作用，如果一些潜规则不在现实中阻止记者新闻信息的正当采集，隐性采访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参考文献：

- [1] 甘惜分. 新闻学大词典[M].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235.
- [2] 陈力丹,郭镇之. 关于舆论监督的访谈[J]. 现代传播,2000(4).
- [3] 顾理平. 隐性采访方法论[M]. 上海:新华出版社,2004:119.
- [4] 王利明. 人格权法新论[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488.
- [5] 王炎龙,殷俊. 以伦理和法制构建新闻自律新体系[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01(6).
- [6] 阚敬侠. 论我国舆论监督法律制度[J]. 新闻记者,2000(4).
- [7] 徐光春. 关于舆论监督的几点思考[N]. 光明日报,2000-01.